

第七卷

中國現代教育家傳

陳雲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编委会编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第七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第七卷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曾卓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88毫米 32开 印张：14.25 字数：326,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

ISBN7—5355—0621—6/G·656

定价：4.60元

出版说明

一、本书编委会约请专家及部分作家、记者，选择自“五·四”运动至今的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将其业绩撰写成传，汇集出版。选择的标准是：在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上有重要贡献，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发展起过重大作用。本书所记述的内容真实可靠，评价客观公正，很多资料系第一次公开发表，弥足珍贵。它系统地介绍了各教育家的教学实践及理论观点，可供现代史学工作者、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参考，亦可供师范院校师生作课外参考书用。本书在写作上力求生动形象，具有可读性。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得到历史知识，学习教育家们的动人事迹和治学、成才的经验。

二、本书将分辑出版，对港、台教育家除已收录者外，也留有适当名额，并陆续进行二集。全书各教育家传记收入的次序按收稿及编辑完毕的时间先后排列；同一辑中则按各教育家的出生年月先后排列。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全体编写人员受到很大的鼓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周谷城教授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并为本书写了序言，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很多教育界前辈及其亲友，全国很多部门、很多地方的同志的热情支持与指教，谨在此一并致谢。

四、本书中有二十一位教育家的传记，曾经以《科学与人》丛书的名义结集出版，本社此次出版时，已将其内容作了修订和调整，另行分辑，特此附加说明。

五、由于编者理论水平及历史知识有限，且限于其他条件，因此难免有缺点及遗漏之处，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60133
序

周谷城

自1919年起到今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五年，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教育工作者中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代表，他们的贡献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引以自豪的宝贵财富。搜集他们的事迹，给他们立传，使他们昭著于世，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看一看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就会发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教育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教育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好几位是教师；“五·四”、“三·一八”“一二·九”等重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北京大学、黄埔军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在中国革命中更是占有突出的地位；很多老一辈革命家、文化战士都曾从事过教育工作，有些人同时就是杰出的教育家；很多职业革命家是从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批职业革命家成为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史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

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我们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非常不够，至今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较系统、叙述较全面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专著。编写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进而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特点，将会在提供线索、搜集资料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无疑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今天，发展教育事业对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的的重要作用，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解决教育问题列为四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这是十分英明的决策。跟一些工业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事业还比较落后，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着新的任务，要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进行改革，加速发展。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然而，我国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落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我们的一些教育实践、措施，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依据，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很多失误。可以说，教育科学理论研究的落后，反过来成了造成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理论研究落后不等于没有理论。“五·四”运动至今，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各种建设人才，也培养出了不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这里就有许多的成功经验，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我们不少教育家在教育理论方面也作了许多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问题是，从整体来看，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比较分散，散见于他们各自的实践、经历之中，缺乏综合和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现在，在选择一批

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理论上有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搜集、整理他们的事迹和教育理论观点,编成他们的传记,这一工作,对于研究、建立我国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计划收入一百位左右教育家的传,分册出版。至于选择标准,本书编者提出如下的意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有重要贡献,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教育工作者,均将考虑收入本书。此外,材料搜集的范围、评价、编写的体例等方面,为条件所限,暂不十分苛求。相信这样作仍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希望它的出版,对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能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

目 录

1	李大钊	乔东光
38	晏阳初	张志善
75	杨 堃	周用宜
89	贺绿汀	陈圣来 常受宗
148	吴大猷	白吉庵
178	马 曜	李文辉
202	马学良	瞿霭堂
223	李国豪	丁润令 李文连
237	许国璋	刘 鸿
256	方 明	唐 旬
278	姚淑平	赵尊党
299	史若虚	王世勋
319	古 元	张作明
342	霍懋征	王晋堂
363	陈君实	沈瑞其
393	姚 晶	李 超 马学新
413	王屏山	梁振名
436	于 漪	郭伟成

乔东光

李大钊



—

李大钊，字守常，乳名憨头，少年时名耆年，字寿昌，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父亲李任荣，字华亭，自幼读书知理，早年患肺病，在1888年冀东大地震中病情加剧，第二年农历三月逝世。母亲周氏因感伤过度，于1891年病逝。李大钊“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祖父李如珍，早年在东北开杂货铺，赚了点钱，添置了90亩土地，家庭生活日趋富裕。这样的经济条件使李大钊从小得到读书的机会。五六岁起，祖父教他识字。平时管教他很严，不准他外出去看赌博，更不许打架、骂人，否则要受处罚。如此严格的家教，对李大钊的成长影响很深。

7岁，李大钊入本村西头谷家私塾，随单子鳌先生读书。由于幼时读书专心致志，才思敏捷，又肯帮助同学背书破讲，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得先生喜爱。他少年时的名字就是由单先生

起的。李大钊对这位蒙师也一直十分尊敬，后来到北京工作时，还定期给他寄书报，每逢假期回家，都要前去探望。在谷家私塾三年，李大钊进步很快。单先生提出，他个人的学问已不能满足李大钊的要求，请其祖父另请高明的先生来教。

10岁，李大钊转入张家专馆，随赵辉斗先生读书两年。11岁时，按当地早婚习俗，与本村赵纫兰结婚。赵纫兰(1882—1933)为人贤惠热诚。在李大钊求学期间，她操持家务，服侍老人，以典当挪借凑钱支持丈夫上学。1920年随李迁来北京，共同生活到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她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挑起抚育子女的重任。1933年在参加李大钊葬礼后不久，含恨病逝，并葬于李大钊墓。

12岁时，李大钊到乐亭县城北井家坨宋家专馆，随黄玉堂先生读书。黄先生是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贡。李大钊在这个时期不仅刻苦读书，成绩突出，而且开始注意思索问题。对于1903年清朝宣布实行“新政”、对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等大事，他都有自己的见解。

1905年，17岁的李大钊参加科举考试，试中。但因清政府废除科举，只得另谋出路，转入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学习。在这所中西合流的学校里，李大钊开始接触新学，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著作，初步了解到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开阔了眼界。

1907年，祖父李如珍去世，家境日趋没落，使李大钊面临失学的威胁。这时，井家坨的宋举人表示愿意资助他去外埠入学。李大钊认为他做官的钱来得不正，没有接受。夏天，他与两三个同学一起到天津报考学校。恰逢此时有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等三所学校招考。李大钊不喜欢学军

医。考银行专修所虽被录取，但他认为“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故“决然弃之”。他“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决定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8月中被录取。

9月入学后，他刻苦学习日语、英语和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知识。对不清楚的问题，总要查阅多种书籍或请教别人，直到弄懂为止。他博闻强记，能诗善文，是学校里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器重和同学们的敬佩。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善于写文章，其文章深厚磅礴为全校冠。”此时，他贪婪地阅读大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象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及19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的理论，开始树立民主主义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1910年11月，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实行宪政。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卷入了这一运动，并为此举行罢课，李大钊参加了罢课斗争。学校教员、同盟会在北京的负责人之一白亚雨当时认为，要求清政府开国会，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他的革命思想不仅影响了李大钊，也团结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白亚雨特别器重李大钊，有意安排他参加一些时事讨论等进步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白亚雨领导发动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英勇就义。他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事迹，深深地激励了李大钊的革命意志，多年后仍在文章中悼念不已。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使渴望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的李大钊感到振奋，并寄予很大希望。但不久，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政局急转直下。李大钊从强烈要求民主自由的愿望出发，对袁世凯

以及大小军阀的专制统治发出反抗之声。1912年6月，他撰写《隐忧篇》一文，尖锐地指出新建立的共和国内在的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六项问题，“凡此种种，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统治者要去掉私心。为了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这年冬天，李大钊到了北京，与一些政界人士进行接触，并与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往，由曹百善介绍加入中国社会党。

1913年2月，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成立。李大钊任该支部干事。接着，他和同学一起组织成立北洋法政学会，4月担任这个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言治》月刊的编辑工作。《言治》共出版6期。李大钊在它上面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诗作。他的同学在评论其文章时给予高度评价：“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学，而君则振翰率举，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发先哲貽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其中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大哀篇》一文，李大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露北洋军阀盗国窃权、侵蚀共和的罪恶行为。指出：“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这并非是共和国家的自身之咎，我们要建立人民的“自主之政”、“自得之权”，人民才能求得幸福。在其他的文章中，李大钊要求文人不应再写厌世之文，而“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这些中肯的议论，有助于人民群众认识袁世凯反动统治的本质，激发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努力去参加战斗。同时，这些言论也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同年7月，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即同友人一起到北京，与同学合作主编《法言报》。其时，研究系政客、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等为取得政治资本，决定从

应届毕业生中挑选成绩优秀者，资助去日本留学，李大钊作为该校成绩突出的优秀生被选中。不料，7月下旬社会党人陈翼龙在北京被捕，8月6日惨遭杀害。同时，反动政府下令追查与他往来的人。中国社会党宣布解散，《法言报》被迫停办，李大钊等只好匆匆地返回天津。这时候，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也遭到失败。时局的黑暗使李大钊极为愤慨和痛心。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接受汤化龙等的资助，出国去日本留学，探索救国真理。对他的志向，他的同学曾这样写过：“君顾自视缺然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其志远而识阔。”冬天，李大钊东渡日本。抵达东京后，住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留学生宿舍里。

二

1914年春，李大钊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对于学习，他把它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这种精神成为他勤奋读书的动力。9月开学后，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时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幸德秋水的著作，也给了他较大影响。李大钊还努力学习外语，熟练地掌握日文和英文。这期间他用英文写过一篇《我的自传》，记述自己从出生到留学日本前的简单经历。他在早稻田大学参加社会活动，曾组织经济学会，担任责任干事，撰写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论文《物价

与货币购买力》，刊登在《甲寅》第1卷第3号上。此时，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1月10日，他在《甲寅》第1卷第4号上发表《国情》一文，提出按照中国的国情，必须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如果硬要把君主制度强加于中国，“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无他术焉”。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

1915年1月，日本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阴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换取对其复辟称帝的支持，随即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这一消息传开后，全国人民激起无比的愤怒。李大钊立即和中国留日进步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组织归国请愿团，分别到北京及各大城市请愿救亡，抗议袁世凯的卖国行径。袁世凯闻讯后对此大为恼怒，竟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輿解散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以停止官费，勒令学生回国，交亲属看管相要挟。可是这些并未能阻止李大钊和进步学生的爱国斗争。为了唤起民众，一致对敌，李大钊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油印散发，流传很广。在这篇战斗檄文中，他痛陈甲午战争以来列强瓜分中国的现状，剖析东西方各国报章披露之十九条内容，指出“凡兹条款，任允其一，国已不国。”“此日本乘机并吞中国之由来，吾人所当铭骨铭心，志兹深仇奇辱者也。”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四万万中国同胞身上，“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他号召中国人民“值此千钧一发之会”，应当“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针对在国家多难之时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产生的厌世情绪，李大钊在同年8月发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这篇文章批评了陈独秀散布的“既然现在的国家不可爱，不如

亡国还好”的论点，指出自暴自弃是错误的，是宿命论的观点，而要使国家由弱变强，只有靠人民自己努力。“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要努力“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他鼓励人民不要因眼前的境遇而“过自菲薄”，而应摒弃病态的“厌世心”，唤起“自觉心”，振奋爱国精神，为洗雪国耻而在所不辞。

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公然宣布实行帝制，自称皇帝。25日，蔡锷等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随后，全国许多地方也纷起响应。1916年1月，留日学生总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护国军筹募军饷，并通过成立文事委员会，加强讨袁的宣传活动。李大钊被推举为编辑主任。为同国内各方取得联系，他在月底从日本到达上海，协同讨袁事宜。两周后又返回东京，主编留日学生总会的《民彝》杂志。春天，神州学会成立，李大钊是发起组织者之一。5月，《民彝》创刊号出版，这一期上发表了李大钊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文章以进化论为依据，阐明代议政治是时代前进的需求，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历史上很强盛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到近代却如此落后呢？他强调指出，这系为“君主专制之祸耳”。“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还重申人民群众的作用，指出“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为了推动反袁斗争，5月中旬，李大钊毅然弃学回到上海，积极从事各派反袁势力间的团结工作，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声讨中病死，反袁斗争宣告结束。

7月，李大钊应汤化龙、孙洪伊之约赴京筹办《晨钟报》，担任总编辑。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出版。李大钊写了代发刊

词“晨钟”之使命》，发出创造“青春中华”的号召。他把完成这一大任的希望寄托在觉醒的中国青年身上，认为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激励他们不怕困难，努力奋斗。在其他几期《晨钟报》上，他还陆续介绍培根、托尔斯泰及其他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极力倡导民主、自由，同时不断地批评不利于改革的现象，其中特别强调指出许多政界人物之间争“权”的危害。第6号报上的警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李大钊经常吟咏的名句。

9月，他在陈独秀等人发起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他从物质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限性的观点出发，坚信中国虽然十分衰弱，但并不注定灭亡，其进步将无穷尽。只要人民共同努力，“白首中华”可以变为“青春中华”。文章还指出了只有打破旧的，才能创造新的。“复活”、“再生”的办法就是革命，就是扫除旧的东西。李大钊教育青年“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努力“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这是一篇“青春中国之再生”的宣言书。它曾被当时进步教师选作中等以上学校的国语教材，对全国青年学生起过巨大的启蒙教育作用。

由于《晨钟报》办报者之间政见的对立，李大钊撰写的较激烈的文章不能在报上刊登，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9月9日作出离开《晨钟报》的决定，发表了《李守常启事》。李大钊在《晨钟报》前后22天，共发表文章14篇，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热情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独裁，揭露了军阀、官僚政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罪恶行径。

同月，保皇党人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精神。同时，在草拟

的宪法中，还明文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对此，李大钊与陈独秀等连续撰文加以批驳，矛头直指维护封建专制的孔子之道。李大钊先后在《宪法公言》等杂志上发表《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尖锐指出，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把孔教列入宪法，完全违背民主自由的原则，这种做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从实际危害来说，它比袁世凯称帝还要厉害，因为它将无形地毒害着人民的思想。他从社会进步的观点，进一步说明“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旧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我们必须以“人为之力”促使旧道德之崩溃，“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出版《甲寅》杂志。李大钊被邀，担任该刊编辑。由于章士钊当时是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李大钊在力求可能的范围内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他在《甲寅》上共发表了70篇文章。这些文章通过评论时政，批判封建专制势力和孔子学说。他期望《甲寅》能够奋发国民努力，开导国民进化。由于与章士钊的政见分歧，不得不于5月停止在该杂志的编辑工作。

这个期间，李大钊开始对进化论发生怀疑，并逐渐认识它的弊病。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者为掩盖其侵略实质所宣扬的“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谬论，他撰文明确指出：“此其所据，全根于马查士（即马尔萨斯）之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还列举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四大缺点，说明战争的真正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时也引起李大钊的重视和兴趣。1917年3月起，他接连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文章，宣传民主主义的思想，大声疾呼实现真正的民主